

“对日战争与亚太社会经济政治变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18年8月25—27日,由昆士兰大学历史与哲学研究学院、华裔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南京大学、西南大学、南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共同主办的“对日战争与亚太社会经济政治变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以及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英国等地的40余位近代史专家、青年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24篇论文,从国际化、多元化的视角对抗日战争史的多个领域进行了探讨。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Tim Wright 教授、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分别为会议作了主题演讲暨第六次、第七次全汉昇讲座;昆士兰大学 Martin Crotty 副教授、Andrew Bonnell 教授和黎志刚教授、西南大学周勇教授也分别作了主题演讲。

Tim Wright 的《三十年代世界危机对中国社会、经济及中日关系的影响》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融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等方面切入,评述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指出这次经济危机对此后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

Martin Crotty 在《澳大利亚视角中亚太地区的记忆、历史与冲突》中指出澳大利亚公众和学界普遍认为一战塑造了当代澳大利亚的国家认同、地位和形象,而二战无论参与程度还是伤亡人数都不及一战,因此长期得不到重视。但是,鉴于今非昔比的亚太格局和国际关系,澳大利亚应更加重视其在亚太地区的活动,塑造了战后亚太格局的二战不容忽视。历史学者应在深度挖掘澳大利亚二战史的同时了解亚太其他国家的历史,以有益于澳大利亚游刃有余地参与亚太事务。

吴景平的《抗战初期围绕中国海关的大国博弈》着重介绍了1938年英日协定之后围绕中国海关问题的大国博弈,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不断劫夺中国海关收入,以军事手段强行控制占领区海关,是导致中国海关无法正常运作的根源。有关国家围绕中国海关问题的博弈,揭示了日本所发动侵华战争的实质是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其影响所及绝非妥协所能解决,只要侵略战争不被制止,大国所力图实现的局部性解决都是暂时的、不可靠的。

周勇在《抗战时期中国重庆外交界研究的新进展》中对其新著《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进行了介绍。该书以大量珍贵的一手档案资料为依据,系统还原了战时重庆外交界的历史,展现了重庆在二战时期的全球影响力,对这一时期全球战争背景下重庆所扮演国际角色的研究空白有所填补,是有关战时重庆外交界研究的新成果。

Andrew Bonnell、黎志刚的《德国与第二次中日战争》探讨了三个问题:德国因何会被卷入1937

年以后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德国因何并如何从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转为与日本合作;希特勒为何在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后选择对美宣战,以致德国卷入全球性战争。

此外会议还围绕政治外交、军事、社会经济与文化、沦陷区与伪政权问题进行了六场专题讨论,综述如下。

一、政治外交

本次会议的论文以政治外交史的研究为多,但较以往研究有了一定突破。政治史的研究同时兼顾中共和国民党的政权建设以及国民政府的政策实施问题。外交史的研究既涉及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关注到美日、英日之间的外交交涉,可以说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某一领域,而是以全球史的视野,在连续、整体的时空下审视战时及战后亚太地区政治变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的《建立新社会:抗战时期中共的权力下探与社会形塑》探讨了中共如何在根据地基层推行其施政方针并对群众加以管理、改造的过程。文章指出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权力下探,控制和动员双管齐下,有效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强力管控,政治经济社会一体控制逐步成形。根据地民众在承受高效机制下并不轻松的负担的同时,感受到了管理和秩序带来的效率与公平。这是一种迥异于之前政治力量的运作模式,通过这种模式,中共所希望创建的“新社会”的雏形在根据地得以实现。

重庆大学张瑾《国际观瞻与战时首都建设——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提案为中心》一文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档案文献为基础,辅以丰富的中外文献,将陪都重庆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背景下,系统梳理了两届重庆临时参议会不同阶段的陪都建设议案,从城市地位、建设计划与形象认知三个基本考察要素,探究了临时参议会的提案实践、战时国际城市形象建构以及战时中国政治与国际地位变迁三者的交互影响。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瑞德的《罗斯福智囊团在战时中国的回响》介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创的由学者和专家组成的智囊团机制。对战时中国舆论界有关罗斯福智囊团的讨论,以及蒋介石效仿此机制数次成立智囊团的经过,做了全面考察,并对其历史意义进行了评价,指出过去学者视蒋介石为一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的政治人物,蒋其实也有乐于采用西方治理技术的一面。

关于日本侵华过程中与英美等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既往研究的基本叙事大体以相关政府为对象,研究内容也大多属于全局性的重大领域,而普通外国人在日本全面侵华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财产、事业乃至生命安全的危险,却未受到足够重视。复旦大学张徐乐《抗日战争前期英日关于“扣船事件”的交涉》一文着眼于普通在华英国侨商,以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基础,梳理了三艘英籍普通商船在1939—1941年间被日军扣押以及由此展开的英日交涉过程,并指出三艘遭日本扣押的英籍商船及相关人员的际遇表明,日本的侵华战争归根到底是对和平环境和国际秩序的挑衅,如不及时制止,就没有可以幸免的旁观者和第三方。

南京大学李玉的《美国驻华领事馆文献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刍议——以前期抗战为中心》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史料编纂虽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国际化步伐尚应加大并加快。美国国家档案馆藏美国驻华领事馆文献卷帙浩繁,其中涉及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与美日关系的内容,是中国抗战史料的一个特殊源头,可以丰富对于国民党抗日态度演变复杂性、动态性及部分细节的认识,为研究者开拓新的研究视阈。对其加以收集、整理与研究,有助于抗战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高士华在《从历史连续性看战时战后亚太政治变动》一文中探讨了日本关于历史连续性的争论,并就国家责任的历史连续性、如何建构中日共同历史记忆、二战中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共同对日战争记忆进行了重点讨论,对记忆重构以及政府、个人在二战记忆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也发表了个人看法。

二、军事

抗日战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战争本身,因此军事史也是本次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学者充分利用中日文史料,特别是日文史料,从中国抗战和日本侵华两个方面做了报告。

香港浸会大学邝智文《从失败中求教训:国军作战记录中的1937年上海—南京战役》以国军在上海—南京战役中的作战报告以及国军军事期刊为基础,从战术、装备、训练、参谋作业、情报通讯、后勤等方面,讨论并检视了国军在战役中的表现。该文指出,国军在战争初期已尽力从战斗中吸取有用的经验与教训,但并未能完全将之转化为实质性的改良。

香港科技大学何杰尧在《“疯狂轰炸,无差别炮击”——1937年至1938年广州空袭修辞与现实初探》中指出中国政府和记者在报纸上刊载日军空袭广州事件时,使用了大量修辞手法,力图塑造残暴无匹的日军侵略者大肆蹂躏手无寸铁的中国人的图景,希望以此引起外国政府关注。但报道同时也透露出广东多地都配备了精良的反空袭武器、组织了自卫军,数次有效地抗击了日军空袭。有时,报道所营造的氛围和事实并不完全一致。

南京大学吕晶、冯翠的《抗战时期粤港澳地区传染病与侵华日军细菌战》根据粤港澳地区档案、报刊等史料以及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相关文献,探讨了抗战时期该地区传染病的起灭与正常检疫、细菌战之间的复杂关系及相互影响,厘清了该地区自发传染病与人为传染病(细菌战)的差异,进而有力证明了日本在全面侵华期间,公然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研制细菌武器,进行残酷的人体试验和细菌战攻击的罪行,深化了对日军细菌战及传染病史的研究。

南京大学张生、唐军《松井南京之行的不同版本及其含义》一文描述了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占领南京期间洋洋自得的姿态,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接受审判时,推卸责任的丑态,并引用兼为上海派遣军参谋长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方证人的饭沼守作为第三者的观察和陈述,对松井石根南京之行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还原,反映了南京大屠杀丰富的历史之维,也体现了历史记述和书写的复杂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晓娟的《日本总体战理论的兴起及其对中日战争之影响》探讨了总体战理论与中日战争、日本战略布局的关系。文章认为,近代日本陆军军人受欧战影响,提出统制军备论、最终战争论等总体战理论,满足了日本国家和军人对外扩张、攫取资源、发动战争的野心。然而,这种德式战争理论因不顾人民生存需要,煽动举国体制,把中、美、苏乃至整个东亚都卷入战争中,最终使日本也遭受到战争的反噬。

三、社会经济与文化

社会历史始终是个体发展的历史,在关注宏观的历史进程的同时,亦不能忽略微观的个人命运。本次会议上,不少学者关注人物史、生活史,探讨了个体或群体在战时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做出的选择和发挥的作用。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吉井文美在《战争时期日本社会的变化》中通过战时在东京生活的一般市民的日记,探究战争时期日本社会发生的变化,并具体考察了日本市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社

会变化。

香港浸会大学麦劲生《抗战期间留德中国学人文化建国的理想——以宗白华、贺麟和张君勱为例》一文通过审视留德学人宗白华、贺麟、张君勱的思想轨迹,探讨了国难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发展出对中国文化的新认识。作者指出三人在20世纪20年代受德国教育和文化的影响,追求个人解放和灵性。但步入晚年后他们却都从不同途径回归传统中国文化,以发扬儒学和中国哲学、美学为己任。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民族危机对他们产生这种变化发挥了重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周祖文的《抗战时期外汇统制下的马来亚侨汇与侨捐》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相关史料对抗战时期的马来亚侨汇与侨捐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战时统制对于马来亚侨汇与侨捐的影响。作者指出,抗战时期,坚持抗战的“最大难关是经济”。在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海外华侨的侨汇和侨捐既是中国外汇的主要来源,也是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力量。在华侨捐款中,以新加坡为代表的马来亚华侨的侨汇和侨捐的数量最大。

香港浸会大学黄文江在《统治即提供食物:香港营养研究委员会简史(1939—1941)》中通过介绍战时香港营养研究委员的建立和作用,从饮食变化、医疗卫生等角度展现了香港市民在战时的生活状态和战争对生活的影响。

四、沦陷区与伪政权

近年来学界已形成共识,要想对抗战进行深入研究,必须加强对沦陷区、伪政权以及汉奸的研究。本次会议上,中韩学者从文教殖民、沦陷区民众生活、伪政权建设、汉奸等方面对战时中国各地沦陷区和伪政权进行了深入讨论。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为支持其侵略战争,在东北大力发展工矿业,因此东北是二战结束前中国各类重工业最密集的地区。为培养高等技术人员及初级作业员,日本殖民者高度重视中国东北的高等工科教育和实业教育。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陈慈玉的《战时中国东北的高等教育与日本(1931—1945)》利用中日文史料,考察了日本在殖民中国东北期间开设的各类高等学校,分析了各学校的学生来源、教育课程及毕业生的工作去向,并与日本在朝鲜和中国台湾进行的教育文化殖民政策进行了比较。作者指出七七事变的前奏是九一八事变,中日战争与其说是“八年抗战”,毋宁可以说是“十四年抗战”来得准确。

天津是华北日伪政权统治的重心之一,较能体现日占时期伪政府的统治轨迹。与影响较大的政治人物相比,既往研究对普通公务员群体几乎鲜有涉及,但他们才是日伪政权得以运转的基础力量。南开大学李金铮的《挣扎:日占时期天津市政府普通公务员之生存状态》利用天津市档案馆所藏史料以及战时天津发行的各类报刊资料,从录用、制度、薪俸、生活、控制等方面,对日占时期天津市伪政府普通公务员的多重面相做了较为具体的考察。并得出结论:普通公务员主要是一批为了谋生而进入伪政府系统的职员,他们既依赖日伪政权,又受其严密监视,在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上都处于扭曲的挣扎状态。

南开大学江沛《苦待和平:战时中国沦陷区民众战争观的考察》一文以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民众的战争观为考察对象,从民族国家与人性两个视角切入,讨论了日伪占领下的长春、北平、上海、宁波四个城市的民众在面对日伪残暴统治时所作出的选择。作者指出,抗战研究应在考虑民族利益、国家认同的同时,也思考民众利益。民众个人利益有时与民族、国家利益不一致是事实,考虑其间的差异有助于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亦有助于重回历史现场并总结经验与教训。

韩国新罗大学裴京汉在《西安事变前后时期汪精卫的对日态度——抗战与反共之间的摇摆与

“亲日”的萌芽》中探讨了西安事变爆发前后,汪精卫回归政界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汪的对日态度,指出汪精卫的亲日立场,并非汪个人一时性的判断失误,而是他经相当长时间形成的对日认识的结果。在沦陷区问题上,对亲日政权或汉奸的研究要做到“客观”并非易事。“汉奸”一词本身就已经体现了对民族背叛者的历史性评价倾向。

在专题讨论之后,本次会议还设有圆桌会议环节。与会专家学者踊跃发言,围绕抗日战争研究提出不少真知灼见。西悉尼大学栗明鲜博士介绍了抗战时期新西兰华侨通过捐款、购买救国公债等方式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情况,强调了华侨抗战在抗日战争研究中的重要性。李金铮教授指出,本次会议就中共革命问题、汉奸问题等热点议题形成了讨论的高潮。中日战争问题涉及研究者的史观、立场、视角,不同视角与立场都是认识历史的侧面,不存在非此即彼。江沛教授认为本次会议的特点是国际化与多元化,所讨论问题的领域较宽。抗日战争研究需要在史料、研究方法等层面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并应尝试从理论上跳出单一民族国家的研究视角。日本学者吉井文美也认为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希望以后继续深化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李玉教授肯定了本次会议在方法论上取得的突破,如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角度研究历史问题。张生教授则提出历史研究应该同时注重时与空两个因素,本次会议学者的研究极有深度又具地方特色,未来提升抗战史研究还需要学者进一步努力。吴景平教授对中国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研究者所做的大量工作,特别是对重要档案进行的整理表示感谢,认为研究者必须把资料文献作为公器。同时指出,中国的抗战研究必须走向国门,吸收海外学者的最新研究,并培养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研究生,让他们把学术传承继续下去。张瑞德教授表示希望加强两岸年轻一代在学术上的合作交流。周勇教授建议把本次会议的研究成果向学术界以外传播、普及,让更多人分享学术研究的成果。邝智文博士和张瑾教授强调了区域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聚集了中、澳、英、日、韩等国家的学者参与,诚如会议主题“对日战争与亚太社会经济政治变动”所概括,会议论文有如下特点:第一,研究视野多元化,不再局限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从“对日战争”的角度切入,探讨了中国大陆和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如何被卷入日本发起的侵略战争以及各国所做出的应对。第二,研究领域从时间和空间角度都具有连续性、整体性,在全球史的视角下,关注到了从1931年前后开始的日本侵略战争对整个亚太地区各个层面所造成的影响。第三,问题意识突出,对沦陷区、战时民众、历史认识、历史记忆、区域抗战等热点问题或研究薄弱领域均有深入讨论。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编高士华在最后总结道:澳大利亚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曾经并肩抵抗日本“大东亚战争”,有着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经历,就这段历史进行切磋和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近几年,《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一直在尽可能地协助抗日战争研究者走出中国,走出东亚,拓宽视野,进行更为广泛的交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向世界讲好中国抗战故事。

[作者马晓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士华)